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 “百家爭鳴”問題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1962年10月

說 明

这篇纪录稿是根据吕振羽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向我校一九五九年班历史专业和历史教研室的同志们所作的报告整理的。此稿未經本人审阅，請勿外传。

历史教研室

1962年9月

一、不断继起的“百家爭鳴”是我国历史的特点之一

关于历史上的“百家爭鳴”的問題，过去中国和外国都有这样一种看法：欧洲古代史上有过两次“百家爭鳴”，古希腊时代有一次，文艺复兴时代有一次；而中国只有一次，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爭鳴”。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出現过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爭鳴”是中国历史的重大特点之一；只是在秦汉以后，在統一的封建帝国的专制主义的統治下，由于中央朝廷的直接参与，爭鳴又常常受到束縛或限制。这个問題在我脑子里装了很久，沒有拿出来。为什么沒有拿出来？因为我考虑过这是不是标新立异？如果是标新立异，那么拿出来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現在經過反复考虑，还是拿出来了。关于这个問題，我已讲过两次：一次是在政协給民主党派人士讲的；另一次是給北京史学会讲的。今天是第三次。我想这并不是标新立异，中国历史的情况就是这样。

毛主席說过，中国历史有它的特点。我看“百家爭鳴”的传统也就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之一。所謂历史特点，就是在共同性的基础上，在一般規律的基础上，各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历史上的“百家爭鳴”的全部情况，我认为在毛主席的著作里，把这个特点概括进去了；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特点的。这个看法合适不合适？大家可以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的百家爭鳴，就是中国历史上比較重大的特点之一。

下面我們先談談古代百家爭鳴的社会性質和历史性質。

过去的历史家都是把古希腊时代的“百家爭鳴”看成是奴隶社会的現象；文艺复兴时代的爭鳴看成是封建社会末期、資本主义前夜、資產階級抬头时期的現象。在我国，过去有些人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爭鳴，于是他們也就把春秋战国看成是中国的古希腊，因此，春秋战国的社会性質也必然是奴隶制度。毛主席在延安时，曾經批評过有些人“言必称希腊”。当时有許多人按照希腊的情况，在中国找奴隶制度；按照日耳曼的情况，在中国找封建制度。其实，有些东西是共同的，有些东西是不同的。有共同性，还有特殊性。共同規律是一致的，但是各国还有各国自己的特点。所以过去把希腊作为奴隶制度的典型，把日耳曼作为封建制度的典型，不符合这些典型的，就不是奴隶制度或封建制度。这种看法是錯誤的，这也是欧洲中心論。

所謂“百家爭鳴”就是意識形态方面的斗争，它是社会上層建筑，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經濟上的利害关系的反映。就是階級社会在一定时代，各階級、阶层、同一阶层中各集团或各流派，在思想上、意識形态上相互間的矛盾和斗争或利害冲突。这在各个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交織着民族矛盾在內。階級、阶层、集团間的矛盾和斗争，不仅体现在經濟上、政治上、階級关系上，同时也不能不反映为意識形态上的斗争。这种斗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加上其他条件的凑合，即社会自然科学知識、生产技术知識的掌握和新的成果的出現，在这些条件下，就必然出現“百家爭鳴”运动。所以，說“百家爭鳴”只有希腊那样的奴隶制度才有，或欧洲封建社会末期、資本主义前夜才有，这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論上是讲不通的。

在其他許多国家，象日本、俄国、古代中亚細亚和埃及，在它們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奴隶制时代，虽然有過思想斗争，但并没

有引起“百家爭鳴”。象俄国、日本，特别是日本，在由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期间，譬如明治维新前后，虽然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但是也同样没有引起“百家爭鳴”。假使说“百家爭鳴”只产生于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前夜，那就和这些国家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

在我国历史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阶级间的战争，一直到各阶层、集团间的冲突和战争特别丰富，特别复杂，特别突出。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以至民族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也是特别丰富、特别复杂、特别突出的。我国“百家爭鳴”的传统和其影响作用，又特别丰富。这种斗争，包括民族间、阶级间、阶层间、集团间，以致对阶级间的矛盾作为基础，在爭鳴传统的影响和推动下，反映到思想上，就不能不表现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彼此的内部，在同一阶级内部或同一阶层中，又不能不存在各种不同流派的分歧同论争。这种分歧和论争，虽然常常包含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譬如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内部也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各自所反映的社会阶级关系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思想家，在反映这种社会阶级属性，反映各阶级、阶层、集团相互间的关系时，各方面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这就不能不发生冲突、争执。在这种形势下，便每每汇成为“百家爭鳴”的局面。虽然，这种爭鳴，又常常是受到限制的。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来看，没有出现象我国这样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的“百家爭鳴”的局面。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社会思想或哲学史中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没有例外的。

这里我想附带谈一个问题，最近吴晗同志在他的《论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中说，在通史里，提到古代哲学家的时候，“在古代哲学家的脑门上贴标籤的现象，看来不在少数。”（《人民日报》1962

年3月23日)譬如王充,都說成唯物主义的,其实王充有唯物主义观点,也有唯心主义观点。有些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也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他說我們是在貼标籤。我对吳晗同志說,你讲的几本通史中大概有我的吧?他說,沒有。我說,不管有沒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給古代思想家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标籤”还是要貼的。他說你只管貼。吳晗同志的这种說法,好象是不承认我国历史上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几年在历史科学上,提出了好些带有重大理論原則的問題,同志們可以研究一下。搞历史的不研究这些問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有困难。

还要附带談到另外一个問題,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是不是还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个问题今天还很难讲。你們可能有希望活到那个时候。不过我想恐怕还是有的。在阶级社会里,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首先是具有阶级性,另一方面也还有属于認識方面的問題。今天革命队伍中也是这样,有認識正确的,也有認識錯誤的,有些人有主观主义片面性。如果主观主义片面性系統化了,就成了唯心主义。将来一定沒有犯主观主义的人嗎?一定不系統化嗎?我看很难說。有主观主义系統化的可能,就有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就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过那时的斗争性質和阶级社会的斗争性質完全不同,不属于不同阶级、阶层、集团間的斗争。但是还存在着先进同落后的差别,有正确同錯誤的区别等等。当然我这里談的只是一种設想,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情况究竟怎样?将来的历史发展会予以充分的說明,但这个问题今天值得研究。

二、出現在我国历史上的几次“百家爭鳴”

下面談一談我国历史上出現的几次百家爭鳴。到底这些算不算“百家爭鳴”，同志們可以研究，希望大家提一些意見。在我国历史上某些时期的思想斗争，能不能算“百家爭鳴”，我看需要通过具体历史情况，作些具体分析和研究。这里我只提出問題，究竟如何具体研究，需要史学界、哲学界共同努力，特别需要我們的同志們来研究一下。

(一) 殷周之际

我們知道，殷朝的天文、历数、医学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創造性成果。但是，那时是不是有“百家爭鳴”？我們今天的文献不够，資料不足，只能看到那时有朴素的辯証唯物主义的“八卦哲学”同巫教神学之間的斗争。这方面，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里談了一些，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說法，同志們可以研究一下，我是不是在貼标籤。另一方面，殷朝奴隶主貴族中也反映了教权同王权的斗争。殷朝前期、中期都是巫教僧侶貴族掌权，巫教僧侶在政治上掌权的，主要表現方式就是貞卜。到了末期，王曾把部分神权夺回到自己的手中，在甲骨文字上出現有“王貞”的記載。这是有过教权和俗权的剧烈斗争的。

微子、箕子、比干同其他奴隶主貴族之間也有斗争或政治主张和观点的分歧。比干最后被杀，箕子也跑掉了。在朝鮮的平壤牡丹山頂上有箕子墓，有人說是假的。我认为，說完全是假的，还不能証明，說完全是真的，也还不能証明，究竟是真是假，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到朝鮮去过两次，有一次到了箕子庙，遇到两个八、九十岁的老

人，他們非常熱心，說箕子是我國人，來到了朝鮮漢城，後來又從中國去了一批人，箕子就把漢城讓給了他們，自己來到了這裡（平壤）。因為箕子對朝鮮的文化有貢獻，所以給他修了坟墓和廟宇。

在殷周之際，有這樣一些鬥爭，有思想鬥爭，政治主張上有分歧，這是不是“百家爭鳴”？材料不夠，不能下結論，但鬥爭是肯定有的。

（二）春秋戰國

這是大家公認的我國第一次“百家爭鳴”。當時科學方面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煉鐵事業的發展和煉鋼術的發明。天文、歷數、物理、農業技術知識等方面都有了發展。

關於這一時期的社會性質，現在大家的意見還沒有一致，有的說是原始公社制；有的說是奴隸制度；有的說是封建制度；也有的說春秋是奴隸制度，戰國是封建制。這個問題還是要請教經典著作。所謂氏族貴族、奴隸主、農奴主，他們的面貌、性格和特點是不同的。氏族公社的自由民、奴隸制度下的奴隸、農奴制下的農奴，他們的性格、面貌和特點也是不同的。這些應該能夠認識得很清楚，不至於混淆起來。但是這幾年有些著作在這方面似乎有些混淆，自由農民、奴隸和農奴的面目不清，奴隸主和農奴主的面目不清。到底是誰混淆了？我說是人家混淆，我清楚；人家也可能說是我混淆，他是清楚的。應該大家都虛心一點，不固執己見，就不至於影響科學前進。

在戰國時期，據我看，初期封建制（也就是封建農奴制）的發展，已經快走最後一步，逐漸向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演進。因此引起了社會的部分質變，階級關係重新構成，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鬥爭形勢。譬如封建領主中有大領主、中等領主、小領主、沒落領主

等阶层,此外还有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和封建领主的地位互相交替,彼此間利害冲突十分严重。另外还有封建领主同农奴、农民的矛盾。由于这些阶级、阶层、集团間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就形成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或者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产生了諸子百家的思想,并展开了諸子百家相互間的思想斗争,也就是爭鳴。

春秋战国时期,最主要的是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在这些学派里,有墨子的唯物主义同老子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关于墨子,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楊向奎同志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中說,郭老和我对墨子是相反的两种說法:一是否定,一是肯定(第394頁)。过去还有人說墨子是代表奴隶主的。关于老子,我和范文瀾同志、关鋒、林聿时同志說他是唯心主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有些同志說他是唯物主义。关于荀子,我說荀子包含着唯物論的强烈因素,有上升到了成为系統的唯物論傾向,但沒有給他戴唯物主义的帽子,因为他确认人性原来是“恶”的,这是先驗主义,恐怕不能說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很多同志說他是唯物主义,这个問題还可以研究。

这时候,一方面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論爭;另一方面又有各个派別内部的不同意見的論爭。唯心主义内部有很多派別,各个派別之間又有論爭。法家有很多派。道家后来有老子正統派和庄子派。儒家有孟子、荀卿等流派。当然,他們不完全是同时的。墨家后来也有不同的流派,梁启超把他們分为左、中、右三派。各个派別的政治主张不同,在爭論中針鋒相对,反映了彼此間的利益冲突。此外,参加爭鳴的,还有法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等等,所謂諸子百家。

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百家爭鳴”。

(三) 两汉时期

当时的天文、历数学、医学等比以前有了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最主要的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经过前汉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所以两个阶级之间不断出现了紧张局势，先后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第一次是秦汉之际的陈胜、吴广为首的起义；第二次是赤眉、绿林、平林的起义；第三次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这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表现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还有这样一些阶层：有大地主，有中小地主。大地主中又有贵族地主，他们是有世袭特权的；有一般地主，没有特权的，其中包括商人地主。此外还有旧领主的残余，项羽就属于这一类。刘邦作了皇帝以后，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这也是领主制残余。地主阶级内部有这样一些阶层、集团，他们相互间有利害冲突，而且比较尖锐，表现为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冲突，曾经演出了平定所谓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前汉末，地主阶级内部又演化为“安刘”、“易姓”两派剧烈的政治斗争。后有外戚、宦官、太学生之间的政争，等等。所以阶级之间的矛盾，阶级内部各阶层、集团之间的矛盾，经过前汉初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后，逐渐地发展起来。

这种矛盾和斗争反映在思想战线上，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带有进步倾向的流派：如《淮南子》的作者。关于《淮南子》一书的著者，署名是淮南王刘安，实际上不是他写的，是他的门客写的。这些知识分子写的东西，反映了刘安的一些思想倾向，也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政治要求和思想倾向。所以《淮南子》一书所表现的思想比较复杂，有唯物主义的东西，也有唯心主义的东西。有政治

上消极落后的东西，也有比较积极的东西。还有司马迁，这是我国中古史学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还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文章也写得很好。近年来把他抬得高了一些，好像他比马克思还高明，这是不可比拟的。此外还有扬雄、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这些人或者是中古的唯物主义，或者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

唯物主义的对立面有董仲舒等人及其流派。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了。我们有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文章说，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那末他就成了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了。他们还说董仲舒以前的孔子也有这样的思想，从董仲舒起，一根红线贯穿下来都是这种思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董仲舒是把儒学降低为神学，把儒学神学化了。他是从神学的立场上替地主阶级说教，归结到所谓“天人合一”论。此外，在他以前的有贾谊、陆贾，表现了由法家学到儒家学的过渡。以后有刘向、刘歆父子，一个是经古文学派，一个是经今文学派。还有参与白虎观和鸿都门辩论会的白虎通派和鸿都门等流派。到了后汉末，则有孔融、郑玄、何休等人，孔融和郑玄是师徒关系，但是属于两个学派，互相论争，有许多见解不一样。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尽管他们的见解中有一点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基本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起主导作用。当时的思想家们以“天命”、“性命”、“阴阳五行”、“讖緯”为中心，表现为神学与反神学、唯心主义同反唯心主义的斗争。

上面讲的唯物主义流派，或者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的流派，那些思想家出现在历史上前后不同的时期，但是在争论中，却表现了鲜明的党派性。例如他们一致同董仲舒等唯心主义流派形成了对立面，批判他们。另外，在自己的唯物主义这一面，则互相肯定，如桓谭对扬雄，王充对桓谭、扬雄，肯定了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

肯定他們的很多主張，並加以宣揚，這表現了鮮明的黨派性。

另一方面，前後繼起的唯心主義各流派間，自始至終存在着儒家學派同黃老學派之間的論爭。表現在桓寬的《鹽鐵論》中，所謂文學、賢良、大夫、御史、丞相之間的激烈論爭。在儒家學派內部，又有經古文學派和經今文學派的論爭，等等，這一直到三國、兩晉。劉向、劉歆父子和孔融、鄭玄師徒之爭，就是屬於這些不同的學派，他們代表了不同立場、不同集團、不同階級的利益。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和馮友蘭不同，馮友蘭不講階級性，只講父子、師徒彼此繼承——所謂抽象繼承。我們要講階級性。

在道家學中，《淮南子》包含的思想比較龐雜，有強烈的唯物主義傾向，又有不少唯心主義雜質。到後漢末期，出現了以道教為軀殼，但和道教不同的所謂“妖道”、“異端”，如“太平道”、“五斗米道”，這是農民的宗教。現在有人拿這個來證明老子是唯物主義的，其實這些農民宗教和正宗道教是生死敵對和互相鬥爭的。如“抱朴子”就是非常反對所謂“妖道”的。

(四) 兩晉南北朝

關於自然科學方面的情况，那時突出的成就是在造船技術和橫法煉鋼等方面，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生產技術方面的新發現和成就，如這一時期寫成的《齊民要術》，則反映了農民生產技術方面的新成果。

從西晉開始，民族矛盾就比較突出，國家由統一走向分裂。在北朝統治區域內，有幾種生產方式并存，相互間就產生了鬥爭。這樣，不只引起南朝同北朝社會經濟結構的歧異和矛盾，特別引起北朝社會階級結構更加複雜，因此社會矛盾也就更加複雜。從而又擴大了南朝、北朝之間以及民族之間的矛盾。一直到生產方式趨于一

致，民族矛盾基本上消失了，南北才由分裂走向統一。所以，在当时形势下，階級矛盾同民族矛盾相互交織。當然，民族矛盾不等于階級矛盾，但在階級社會，民族矛盾的基本內容，實質上是階級矛盾。北方的生產受到很大破壞，社會殘破。北方統治階級的主体是鮮卑貴族，在那樣的社會矛盾下，他們受到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對。統治階級為了要保護他們的統治，極力想在思想意識上來証明他們的統治是合理的。于是一面說外國的東西比中國的好，譬如說佛教是外國的，就說佛教產生的地方乃是真正中國；另一方面，又說他們原來也是黃帝的子孫。南方的大地主統治集團，一方面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另一方面，在當時的情況下，對前途感到悲觀失望，對社會的現實問題感到無力解決，非常苦悶。中小地主對於居于統治地位的大地主集團失去了信心，非常失望，同時感到社會那樣動盪不安。也為自己的前途感到苦悶，等等。

這裡提出一個問題，請同志們注意一下。過去托派不注意民族矛盾，不注意幾種不同生產方式的矛盾。並且有意掩蓋這些矛盾。我們今日應該注意，如果不注意南北朝社會的民族矛盾，不認識北朝有幾種不同生產方式并存，及其相互間的鬥爭，我看就無法認識當時社會的本質，就無法了解當時社會的客觀規律，同時也沒有辦法理解當時社會上層建築的政治情況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規律性。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幾度出現，如果不掌握這一條，我看，要了解中國歷史就有困難。

在這樣的社會形勢發展過程中，反映在思想意識上，就展開了一幅錯綜複雜的鬥爭圖畫。

從西晉起，有劉鯉、劉孝標、范縝、何承天、裴頠等的唯物主義或唯物主義的傾向。在他們的對立面有何晏、王弼、荀子良、葛洪等。此外，佛教里也有些人，如僧祐、鄭鮮之、宗炳、僧愍等的唯心主義。

当时存在儒家学、道家学、佛家学。他們爭論的主要問題，在“有”、“无”之爭。唯物主义方面认为一切是从“有”而来；唯心主义說是“无”。这是他們的主要論点。如裴頠写了《崇有論》。刘孝标写了《辨命論》。何晏等主张“本无”，佛教写的东西主张“心无”。接着又就“神灭”、“神不灭”展开了論爭。如范缜写了《神灭論》；唯心主义者說神不灭，如南朝的郑鮮之写了《神不灭論》，还有一个和尚曹思文写了《难神灭論》，等等。

爭論的另一基本論点是“夷夏”和“反夷夏”。主张“夷夏論”的承认有民族矛盾，“反夷夏論”的不承认民族矛盾。如僧愍写了《責夷夏論》，……这些爭論在当时也很激烈。

各派内部也有爭論。如范宁反对王弼、何晏，說他們为“言伪”，是“禍国、禍一世、罪万代”。

儒、佛、道之間的斗爭是很激烈的。在南朝甚至被提到理論原則上来闡明为什么要反佛。南朝的統治者极力想使儒、佛、道調和；而北朝的統治者則說胡人應該信佛。例如和尚佛图澄就是胡人。在北朝道和儒是联合反佛的。道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儒学是地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东西。联合反佛的有寇謙之、楊街之、高謙之等。北朝崔浩，他为了反佛，拜寇謙之为师，企图利用孔子。在当时有所謂“二教說”、“三教說”。北朝佛教的势力很大，超过俗权政治势力。佛教寺院占了很多劳动力，还有武器。有人說佛教要造反，鼓动魏太武帝反佛。北周也反了一次佛。但南朝的反佛与北朝不同，表现为严夷夏的界限以“夷夏論”去反对“反夷夏論”，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当时不管是南朝还是北朝，斗爭是尖銳复杂而且十分剧烈的。南北朝本来是一个国家，分为两个政权，意識形态上各有自己的特点，同时又相互交錯。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百家爭鳴”。

(五) 唐朝

唐朝的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的成果是更明显了。唐朝是中国中世经济发展相当高的时期，随着唐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土地兼并强烈地进行。很多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土地，大地主享有特权，不负担徭役，徭役和赋税主要加在农民身上；中小地主也要负担，但他们可以转嫁给农民。农民、独立手工业生产者等由于苛重的负担和大量的失去土地，纷纷逃亡，以致后来形成大量的有户无人、有税无地的严重现象。或托于佛教寺院的庇护，成为佛寺的佃耕农民，他们不向封建国家负担赋税徭役，但是要向寺院缴纳自己的劳动成果和服役。因此，僧俗各统治集团间产生了利害冲突，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首先表现为争夺特权、争夺劳动力的斗争，其目的是为了支配农民。佛教寺院里养了成千成万的和尚，不劳而食，享有特权。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反映为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在寺院地主内，又有佛教同道教之间的矛盾。后来表现为宦官同官僚集团及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与藩镇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反映到思想上，在世界观上就表现为唯物论同唯心论的斗争，以及唯心主义各流派间的斗争。

唯物主义者有的以道家的姿态出现，有的以儒家的姿态出现。他们有党派性。他们不受传统的道家、儒家的支配。唯物论者有吕才，他的著作收集在《道藏》里，他反对迷信，反对“禄命生成说”。关于柳宗元，我原来估计为二元论，现在很多同志认为他是唯物论，我又摸了一下，他们的估计是对的。皮日休，他是参加过黄巢农民起义的。此外还有无能子。唯物主义的流派主要是这些，他们与唯心主义的论争，如柳宗元与韩愈之间的论争，吕才与儒道各派的论

爭，等等，都是針鋒相對，比較尖銳的。

唯心主義者有韓愈，他在世界觀上、政治上有很多方面是落後的，但他在文章體裁上有功，他反對南北朝的駢體文，提倡散文，所謂“文起八代之衰”。此外有李翱、傅奕、朱仲卿等。佛家裏有僧一行（張公謹的孫子）、慧能、普寂、道宣等等。道家學派有孟詵、李淳風、趙歸真、王哲、叶法善等。這些都是唯心主義的。

儒、道、佛之間是有鬥爭的。韓愈、傅奕都反佛，佛教中如道宣、法琳等反對傅奕，道宣有《箴傅奕上廢省佛骨表》、法琳的《反傅奕廢佛僧事》，《答李仲卿‘辨正論’》等等，都是針鋒相對的鬥爭。儒家裏的韓愈、李翱在“性”、“情”上也是有分歧的，……。

唯物主義者或者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如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在政治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分歧，如對於“天”（世界觀的爭論）、對“均稅”等問題就有不同的意見和爭辯，他們對於韓愈、李翱的爭論也是不一致的。

所以，當時這種鬥爭，也構成了我國歷史上的“百家爭鳴”。

（六）兩 宋

這是第五次出現的“百家爭鳴”。當時的自然科學和技術成果，具體表現為火藥、印刷術的發明，羅盤針的改進，等等。

兩宋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自始至終比較突出，這兩個矛盾，兩宋朝廷始終沒有處理好。所以經濟力量雖然強，政治上却很軟弱。由於兩宋封建經濟的高度發展，自由商人、手工業者 and 個體農民等獨立生產者經濟的增長；大地主集團一方面兼併土地，一方面不斷擴大特權，甚至擴展到市場上、商業中，擁有所謂邸店或邸肆，構成了大地主集團同自由商人、手工業者 and 個體農民以至中小地主之

間的矛盾。宋朝的农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自始至終是比較緊張的。北宋王朝建立不久，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順等的起义。大地主集团同独立生产者之間的矛盾开始出现，而且逐渐发展起来。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間的利害冲突也日益激烈，表现在特权上、赋役负担上和商业等方面。两宋的大地主集团对辽、金是屈辱妥协的，每年拿出大批的金銀、布匹、綢緞等財物繳給辽、金統治者，这些都是从广大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因此这更加剧了大地主集团同其他阶级、阶层之間的矛盾。这种阶级、阶层之間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在整个两宋时期，都是一天天加剧的。虽然是一张一弛的。

两宋时期的民族矛盾表现为辽、金、西夏的統治集团南下在汉族地区进行军事压迫，杀戮人民，掠夺财产，社会生产遭受破坏，这不仅影响到个别的阶级，也影响到各个阶级。民族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政权的对立以至武装对抗。它反过来又加剧了内部阶级矛盾，大地主集团的妥协投降派同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抗战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种种矛盾表现到思想上，就展开了一幅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这次百家争鸣的浪潮比唐朝要高，范围要广。首先表现在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唯物主义或者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的，如张载，有人说他是唯物主义，我说他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因为在政治上他是复古的，主张回复到初期封建制度去，他的世界观有许多地方是暧昧的，并且是唯心的。一般说，一个真正唯物主义者不可能在政治主张上是反动的。当然，在特殊条件下，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也会产生矛盾。如果张载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就必须从当时历史实际来研究他产生如此矛盾的条件。在唯物主义或其倾向方面，突出的是叶适（叶水心，永嘉学派），此外，还有康与之、陈亮（即陈同甫，永康学派）、李觥等人。王安石具有强烈的唯物